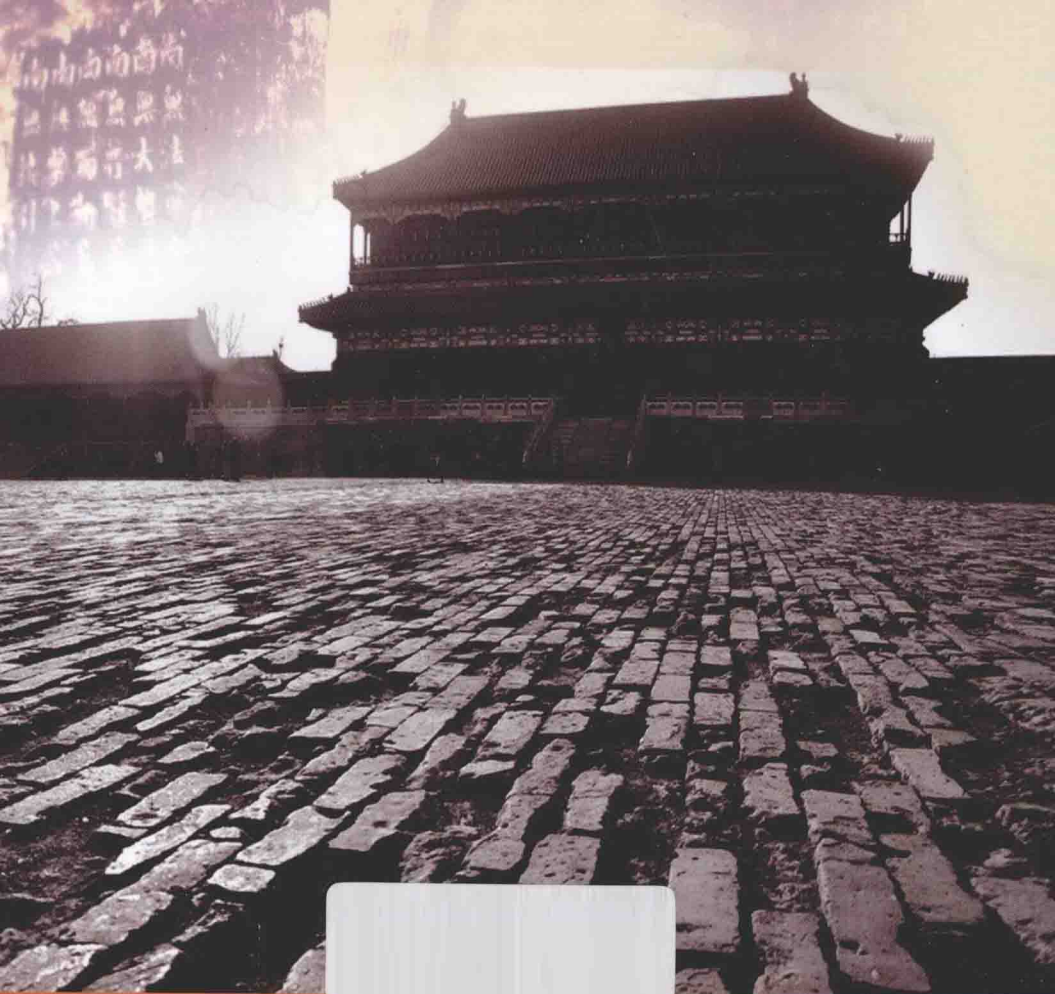




燕京八景等九则千古之谜

深蹟索隱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燕京八景等千古之谜 探赜索隐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京八景等九则千古之谜探赜索隐/李文辉著. —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3
ISBN 978-7-113-17626-6

I. ①燕… II. ①李… III. ①名胜古迹—研究—北京
市 IV. ①K928.7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3269 号

书 名:燕京八景等千古之谜探赜索隐
作 者:李文辉

策划编辑:王 楠
责任编辑:朱景芳 电话:010-51873698
封面设计:博 翱
责任校对:龚长江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印张:9.5 字数:260 千

书 号:ISBN 978-7-113-17626-6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千古金台安在哉	1
蓟门烟树今考	25
北京有两个琼华岛	48
北京太液池钩沉	69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考证	91
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辨证	245
岳飞书《出师表》考辨	260
“陶唐”辨证	277
无独有偶的苏书《醉翁亭记》	295

千古金台安在哉

【摘要】 战国时，燕昭王于公元前 311 年即位后，为了振兴破败的燕国，采纳郭隗建议，拜隗为师，为他修筑了一座崇台，上建官室，经常来此受业；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结果，贤士凑集，燕国由弱变强，一举打败强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以金台招贤被千古传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佳话。金章宗时将黄金台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名曰“金台夕照”。时至今日，燕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黄金台，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大量历代史地资料、文人笔记诗作及今日街巷走向、地形地貌，反复印证，去伪存真，辨明了当年黄金台的确切方位。

【关键词】 燕昭王；郭隗；黄金台；金台夕照

金台亦称黄金台、燕台、隗台、郭隗台、贤士台、招贤台，得名于燕昭王（？～前 279）为郭隗筑黄金台史事。燕昭王于公元前 311 年即位，为振兴燕国，改革政治，采纳郭隗建议，为他建造了一座崇台，置千金于上，用以招纳天下贤士，人称黄金台。由于金台招贤，贤士凑集，燕国由弱变强，终于打败强齐，成为七雄之一。是以金台招贤被后代传为佳话，文人墨客发思古幽情，慨时势是非，题写了许多诗篇。时至今日，悠悠两千余岁，燕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黄金台，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辨明金台有无，方位何在，还其面目，自是祖国文化应当解决的问题。



一、昭王筑黄金台

燕昭王是否为郭隗筑过黄金台呢？

辑录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著述的《战国策》云：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诤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响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前 104～前 91）撰成《史记》，其在《燕昭公世家》中云：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世争趋燕。

曾将战国史官和策士著录汇编为《战国策》，奉诏领校中秘群书的西汉刘向（约前 77～前 6）于鸿嘉四年（前 17）撰著的《说苑》云：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愿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理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座，南面居。

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后汉孔子二十世孙孔融(135~208)于建安九年(204)在《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云：

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晋代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268~320)，以《战国策》所记战国史事未为尽善，遂参据《史记》，考其异同，撰成《春秋后语》。该书云：

燕昭王曰：“安得贤士以报齐仇？”郭隗曰：“王能筑台于碣石山前，尊隗为师，天下贤士必自至。”如其言，作台，以金玉崇之，号黄金台。

南朝宋诗人鲍照(421 左右~465 左右)在《代放歌行》诗中云:

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今君有何疾,临路独徘徊。

从以上史书所说,可知燕昭王拜郭隗为师,并为其改筑宫室,确有其事。可是,《战国策》、《史记》、《说苑》但言燕昭王为郭隗筑宫,不言筑台;孔融、孔衍、鲍照但言筑台,不言筑宫。此当何解?宫与台是否本一?

现就古代台和宫室形制及两者关系作一探讨。

台的形制。《说文》云:“观四方而高者。”是知台为以砖土筑成的方形高平建筑。昔帝尝、尧、舜在昆仑东北各有两个四方台;夏代筑于阳翟南的钧台,陂方十里;周文王筑于长安西北的灵台,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春秋战国所筑之台有的仍守古制。如:韩之望气台,高一十五仞。但更多的则在台上另加屋室、宫观、楼馆等建筑。如:鲁之观台,上有豪华的乾溪室;魏之灵台,上立层楼;秦之琅邪台,上筑馆舍和四时祠。汉时台上加筑宫室更为普遍。如:鸿台,高四十丈,上起观宇;柏梁台上的建筑,以香柏为梁,香闻十里;神明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宫。[1]

宫室建制。《尔雅·释宫》云:“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即宫、室同义,都是房屋的意思。当时宫指一般住宅、房屋,居者不分贵贱。秦汉之后,宫成了帝王所居的专称。如:秦有阿房宫;汉有未央宫。

至于台与宫室建筑的关系,宋代之后学者据《仪礼》研究,得知春秋时代宫室均筑于高出地面的台基上,进入宫室,须登台阶而上。台上宫室一般坐北朝南。南面宫墙正中有门,门内有院。院内北为主要建筑,其内部分堂、室、房等。[2]

我们再就燕国之台与今世传作黄金台的台制建筑进行探讨。

燕上都蓟城有宁台。《史记·乐毅列传》云:“齐器设于宁台。”齐器是缴获齐国圭璧类珍宝。燕惠王不可能将珍宝陈放于宁台上的露

天下，说明宁台决非只是砖土筑成的平台，其上必有宫室建筑。

燕下都有酈道元所称的大、小金台和兰马台。大金台今称武阳台，小金台今称张公台，兰马台《易州志》谓亮马台，今称老姆台。建国后几经考古发掘，武阳台遗址有战国陶片、瓦片和陶管下水道。张公台遗址有瓦片、红烧土和草泥烧土块。老姆台遗址有长形砖、布纹瓦和点纹、蝉纹筒瓦残片；说明这些台上亦曾有过宫室建筑。

传为金台保留到今世的满城县贤台，上有延贤堂。

由此推想，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金台上面亦当有宫室建筑，只不过《战国策》、《史记》、《说苑》但讲筑宫，未讲宫下高台；孔融、孔衍、鲍照等学者但讲高台，未讲台上宫室。归根结底，其实一也。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抵宫室为砖木构筑，易于毁废；高台为砖土构筑，即使毁废，土阜也会长时保留。是以千百年后，宫室倾圮殆尽，人们见到的便只有宫室下台基的土阜了。因此判断：昭王为郭隗改筑的宫室就在黄金台上。换言之，后人所说的黄金台就是昭王为郭隗所筑宫室的台基。



二、相传金台一何多

燕昭王在位时着力经营了燕上都薊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和燕下都武阳城（今易县东南，北、中易水间高陌一带），因而上都和下都诸多土阜被后人视为金台遗迹。

一曰大金台，现代考古学称武阳台，在易县东南 30 里金台陂侧。

二曰小金台，现代考古学称张公台，在易县东南大金台东北 125～160 米处。

三曰东金台，在河北省定兴县西。

四曰贤台，在河北省满城县东 20 里。

五曰黄金台，在金中都大北阁东南隗台坊内。

六曰黄金台，在金中都奉先坊元福寺内。

七曰大、小金台，在明顺天府署东南 16、15 里，约今日坛公园之西

南方里许。

八曰金台，在北京永定门外东南 3 里许。

九曰黄金台，在北京朝阳门外关东店南苗家地教场东，即今金台路处。

十曰黄金台，在北京广渠门内夕照寺中街之夕照寺。

十一曰黄金台，在北京内城灯市东口路北二郎神庙。

十二曰黄金台，在北京外城金台书院，即今前门外晓市大街东晓市小学处。

十三曰金台，在北京大兴县黄村镇南 21 公里的礼贤镇西。

这些金台可分两组，一至四为一组，计四个，以燕下都为中心，分布于易水之滨；五至十三为另一组，计十个，以燕上都为中心，分布于古蓟城内外。

史载昭王为郭隗修筑金台只有一座。这些金台当然不会全是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那么其中有无郭隗金台？如果有，又是哪一座呢？我们不妨分两步探求：首先弄清它在上都还是下都，然后再确定该组中哪座是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台。

三 隗台宜在燕上都

判断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黄金台在燕下都武阳城的第一人为北魏酈道元(466 或 472~527)。其在《水经注·易水》[3]中云：

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丽矣。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陂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高十余丈。昔慕容垂之奔范阳也，戍之，即斯台也。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

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

意欲图还上京（指今河南洛阳），阻于行旅，造次不获，遂心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贤，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垂。言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故凋墙败馆，尚传鐫刻之石。虽无《经》、《记》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

查《晋书·慕容垂载记》未见其奔范阳戍金台的记载。《水经注疏》谓：“王隐《晋书》曰：‘段匹磾讨石勒进屯故安县故太子丹黄金台。’”查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五史·晋书·段匹磾传》谓：“段匹磾进屯固安以候众军。”[4]未言及“故太子丹金台”。退而言之，即使如《水经注疏》称引，“燕太子丹金台”亦不能说成是“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金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能混为一谈呢？何况燕太子丹是燕昭王的来孙（即其第六代孙），两人前后时间差距约五六十年。燕太子丹时郭隗早已去世，太子丹又怎能为其修筑黄金台呢？

再有，燕昭王还曾为邹衍筑过碣石宫（亦称碣石馆）。又乐毅击败强齐，报燕惠王书中提及的宁台、元英、磨室、蓟丘，均在古蓟城，何以惟有金台不在蓟城？

还有燕昭王既拜郭隗、邹衍二人为师，并常往二师处受业，若郭隗所居的金台在燕下都，此与燕昭王所都蓟城相距二百余里，往返一趟要几天的行程，又怎么可能常往该处受教呢？

另外，郭隗本为燕国人，怎能被列为自远而届的诸侯之客，馆之南垂呢？

从以上诸多相互牴牾的史实可知，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金台决不会在燕下都。

判断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黄金台在燕上都的第一人为南朝梁任昉（460～508）。《梁书·任昉传》云：

任昉，字彦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幼好学，早知名。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年十六岁，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高祖践阼（502），拜黄门侍郎，以本官掌著作。寻转御使中丞秘书监，校讎秘阁四部。坟籍无所不见，家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任昉不仅家藏图籍丰厚，且在都城皇家秘阁中讎校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得以涉猎诸多图籍，占有丰富的史地资料，因而他在《述异记》[5]中十分肯定地说：

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

《述异记》是任昉在讎校经、史、子、集中摘录的罕见珍贵资料。《四库全书大辞典》对它的评价谓：“是书采辑先世之事，纂新述异，皆时所未闻，将以资后来属文之用。”

既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判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金台在燕下都武阳城，全无《经》、《记》可凭，仅以燕下都耆旧无稽之谈为据，贸然结论，且这一结论与诸多历史事实相牴牾。因而，我们认为应该沿着任昉《述异记》中指明的方向，在燕上都蓟城去探求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黄金台的方位。



四、昭王国都在蓟城

历史事实是，燕国都城有过变迁。那么，燕昭王时，燕国都城在何处呢？

燕国都城的变迁，见诸史书的如下：

一曰，召公奭初都中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山海经》以今房山县和门头沟区之大坊山、百花山等为燕山。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汉良乡县（治所故址在今房山县窦店镇西）“在燕为中都。”建国后，召公奭初都基址被发现，城垣东西长 850 米，文化遗存上自商代晚期下迄西周晚期，位于房山县窦店镇京广铁路西侧之董家林。此地确在大坊山东南的原野上。

二曰，桓侯徙都临易。裴駰《史记集解》引世本说，燕十六世主“桓侯（前 697～前 691 在位）徙临易。”又引宋忠注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唐李泰《括地志》云：“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治所在今雄县西北）东南十五里。”明清间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判“废易县在（雄）县北三十五里。”1976 和 1979 年在雄县西北的容城县境内发现战国铜鼎、铜壶各一，铜壶盖二。铜壶盖上一刻“左征”一刻“右征尹”，铜壶腹刻“西宫”。鼎为立国重器，尹为辅弼之官，壶刻“西宫”宜为宫中用具，为“桓侯徙临易”提供了重要线索。判临易于此左近，虽不中不远矣。

三曰，襄公徙都蓟城。桓侯徙都临易大抵与山戎侵袭燕国有关。公元前 664 年（燕庄公二十七年，齐桓公二十二年），齐桓公发兵救燕，伐山戎，军至孤竹（今河北卢龙县至辽宁朝阳市一带），使燕转危为安。燕庄公去世后，襄公于前 657 年即位，又从临易迁都蓟城。自此直至燕亡，未曾迁都。史载三事可资左证：其一，《韩非子·有度》云：“燕襄王（按襄公）以河为境，以蓟为国。”“国”训义“都城”，燕襄公时确实都蓟。其二，《史记·六国表》载燕文公（燕文侯）二十八年（前 334）“苏秦说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燕文侯云：“燕南有滹沱、易水，……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故常山城，在今正定县南八里）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从易水至今北京城区西南部，约二百余华里，适是古代行军四五日途程。其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燕经过：“（秦王政）二十年（前 227）……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前 226)……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史记·燕召公世家》言及此事时说:“秦王……使将军王翦击燕,(燕王喜)二十九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可见燕王喜时,燕仍都蓟。

燕自十八世主襄公至四十三世主燕王喜灭亡,一直都蓟,其间的三十九世主燕昭王都蓟,自无疑义。因而,我们就需要在蓟城一带去探求燕昭王为郭隗所筑黄金台的踪迹。

然而,蓟城的方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探求蓟城自战国迄今城池变迁的踪迹;二是探求黄金台与每一时期蓟城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辨明蓟城内外出现的诸多金台中,哪个是真的?那些作伪者又是怎样出现的。



五、变迁几度蓟城踪

蓟城的方位,从战国至辽、金,基本上坐落于今北京城之西南部,即今宣武区一带,但严格说来,其方位或因灾异所迫,或因政治所需,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分作三个时期:一为战国、秦、汉、三国时期;二为晋、南北朝、隋、唐、辽时期;三为金中都时期。

现在,我们把上述三个时期的蓟城方位简述于下:

(一)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上下水道工程、南护城河拓宽工程、中小型市政工程和人防工程,发现了大量战国至汉代古陶井和古墓葬,为查寻古蓟城方位提供了线索。

战国至汉代陶井。最密集的是自和平门至宣武门与西便门之间,迤南、迤北多处发现,范围北至大木仓胡同,东至韩家潭,西至滨河路,西北至真武庙三条,西南至椿树馆,东南至陶然亭。

战国至汉代墓葬。迤北在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迤西在白云

观之西的蓟丘，迤南在法源寺北、白纸坊以北、地图出版社、陶然亭、天坛、北京南站等处。〔6〕

陶井是人民生活用水处所，宜在城内；墓葬是死者瘞埋处所，宜在城外。以此推断，燕王蓟城北垣约在今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外大街一线；南垣约在今白菜湾、南线里、法源寺北、永安路一线；东垣约在今延寿街、陕西巷、万明路、西经路一线；西垣约在今真武庙路、广安门外北南街一线。

另外，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报道：北京广安门南700米，护城河西岸，发现了战国陶制饕餮纹瓦当等物，为典型的战国遗物。根据瓦当推测，它非一般平民所用，而应是宫室、庙堂等高大堂皇的建筑物构件。原报道又说，瓦当发现地点，并有文化层厚1米以上。有饕餮纹瓦当，又有文化层，将这里判为战国蓟城宫室，是合情合理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战国、秦、汉、三国时期蓟城区域的方位大体可以确定；二、战国时期燕国上都蓟城的宫室在城区内西部。

（二）晋、南北朝、隋、唐、辽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原蓟城被洪水冲毁，先后修筑了子城和罗城。

1. 子城的修筑

刘弘于295～300年（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五年～永康元年）都督幽州诸军事时，修复了历经洪水灾害的蓟城，唐时称此城为子城。此城从原蓟城位置的东、北两个方向向内收缩，西、南两个方向向外拓展。值得指出的是其东垣不是南北直线，而是自南横西街迤北向东偏斜，即今教子胡同的走向，在春风胡同与麻刀胡同间偏斜尤甚，过麻刀胡同后直北，沿广安胡同与思源胡同而行；北垣在槐柏树街、马沟庙、洗马沟一线；西垣在今手帕口北南街一线；南垣在今樱桃二条、崇效胡同一线。

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846）《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谓：

舍利本大隋仁寿四年(604)甲子岁,幽州刺史陈国公谯抗于智泉寺创木浮屠五级,安舍利于其下,即子城[7]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

智泉寺原名尉使君寺,系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元象元年(538)幽州刺史尉长命造。后改为智泉寺,则天后时改为大云寺,开元中改龙兴寺。在今法源寺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处。由此处向西百步,即今教子胡同与南横西街相交处。这里既为子城东垣,亦为子城东门即蓊门所在(参见拙文“蓊门烟树在哪里?”《燕都》期刊1991年第1期)。“教子胡同”实为旧子城毁废后形成的胡同,其“教子”二字实为“旧子”二字演变而来。

2. 罗城的修筑

前燕皇帝慕容皝于352~357年(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八年~升平元年,亦即前燕慕容皝元玺元年~光寿元年)建都于蓊时,为巩固城防,加筑了罗城。其北垣自今头发胡同直西,至白云观和会城门公园间蓊丘出土残垣北壁处;西垣从蓊丘出土残垣西壁起,沿过甘石桥后的莲花河东岸直南;南垣在今白纸坊东西街两端延长线上;东垣在烂漫胡同西侧和校场五条一线,南、北分别与白纸坊东街和头发胡同相交。

《析津志辑佚》“白马神君庙”条记载此事云:“昔慕容氏都燕,筑罗城,有白马前导。”这个罗城既筑于刘弘所筑蓊城后,又筑于刘弘所筑蓊城外。则刘弘所筑蓊城为内城,唐时称“子城”;慕容皝所筑罗城为外城,唐时亦称“大燕城”,或省称“城”。[8]

唐昭宗李晔景福元年(892)将舍利藏于悯忠寺观音阁中,其《景福重藏舍利记》谓:

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

此“大燕城”即指慕容儁由白马前导所筑的罗城，“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康衢”即今“南横西街”。悯忠寺当时即处于晋、南北朝、隋、唐、辽时期的大燕城内东南隅。

晋时王浚、慕容儁，唐时安禄山、史思明，辽代都曾在蓟城修筑宫室，宫室外都筑有皇城，唐时称“伪皇城”。[9]但这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故从略。

就中，刘弘修建子城与本文关系十分密切，有必要予以说明。

古蓟城缘何迁移？不见史书记载。这一地区古文化遗存极为罕见，出土陶井均缺上半截，说明古蓟城可能毁于洪水之灾。那么毁于何时呢？牛街北口被毁陶井底部发现少量“五铢”钱和王莽“大泉五十”铜钱。“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自汉而下历经三国、晋、南北朝与隋朝，一直沿用至唐武德四年（621）才被废止。历时739年，为时甚久，难以确定陶井毁于何时。而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始铸于汉孺子婴居摄二年[7]，沿用至新王莽地皇四年[23]，时仅十六年，则可判古蓟城毁于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后。那么，此后有无洪水为害呢？

历史事实是：三国魏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刘靖，为巩固边防，屯田种稻，于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组织军士千人，在梁山（今石景山）筑戾陵遏，遏东筑车箱渠，由戾陵遏分水（今永定河）一支，经车箱渠入高粱河上源，流经蓟城北，岁灌二千顷；水主流仍流经蓟城南。魏元帝景元三年（262），樊晨又增辟水道，自高粱河上游迄于潞河（今潮白河），流经四五百里，灌田万余顷。至晋惠帝元康四年（294）二月，上谷地震。八月，上谷郡之居庸地陷裂。这期间，戾陵遏亦因而受损。次年（295）六月，高粱河洪水暴发，戾陵遏冲毁四分之三，车箱渠南岸荡然无存，北岸仅剩七十余丈，洪水倾泻，激浪滔天。南岸下即蓟城，可惜千古名都毁于一旦。[10][11][12][13][14]

魏刘靖之子刘弘于西晋惠帝元康三年至永康元年（293～300）都督幽州诸军事，继承父业，于元康五年（295）用工四万余，修复了戾陵